

空间的交融与身份的游走： 乡土文学与影视的视觉符号表达

巩周明¹ 李云霞²

(1.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730000)

(2.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730000)

【摘要】从文学到影视, 乡村空间所呈现的符号具有明显的归宿性与精神的牵引力量。跟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乡土文学所构建的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规则模式, 其本身在发展中延续的乡土情感也在城市空间的演进中发生着变化。原本固定的、自然的、封闭的乡村空间格局逐渐被打开, 现代的、乌托邦式的城市空间不断为乡村空间制造着向往却又困囿式的精神欲望。因此,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人们的身份也不断地在“城里人”和“村里人”之间游走。在这种空间的交融与身份的游走, 不仅改变了以往乡村空间的规则, 也在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中呈现出新的样式。本文将结合当下“改编热”的影视背景, 针对新时代浪潮下城市与乡村在空间变换、人物身份和乡土文学影视化的符号表达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空间转换; 人物身份; 影视化; 符号

Integration of Space and Wandering of Identity: Visual Symbolic Expression in Native-Soil Literature and Film

Gong Zhouming Li Yunxia

(1.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nning District, Lanzhou City,Gansu Province)

(2.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nning District, Lanzhou City,Gansu Province)

[Abstract]From literature to film and television, the symbols presented by rural space bear distinct attributes of belonging and spiritual attraction. Along with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rural space constructed by native-soil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formed its unique normative pattern. The native sentiment inherent in its evolution has also undergone changes ami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 space. The originally fixed, natural and enclosed rural spatial pattern has gradually been opened up, while the modern, utopian urban space has continuously generated a yearning yet constraining spiritual desire for rural space. Consequently, exchang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people's identities have constantly wandered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villagers". Such integration of space and wandering of identity have not only altered the previous norms of rural space, but also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in literary and film work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rrent "adaptation boom"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into three dimensions under the tide of the new era: spat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作者简介: 巩周明, 1992年12月出生, 男, 汉族, 甘肃兰州, 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戏剧与影视学、中国电影史; 李云霞, 2001年4月出生, 女, 汉族, 甘肃武威, 在读硕士, 西北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 戏剧与影视学。

areas, character identit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in the film adaptation of native-soil literature.

[Keyword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 identity; film adaptation; symbolism

乡土文学的发展是对乡村空间变迁映照的结果,是反映乡村生活、传达乡土情感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表现人与人之间情感意向的重要途径。当它与影视相融合时,便更加生动形象地将质朴的农村生活与乡土文化呈现出来。由此,学界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新乡土写作’就是以这种‘城——乡’的双重视角书写复杂的中国现状,‘乡下人进城’成为文学新的时代主题”^[1]。毋庸置疑,“新乡土写作”的出现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也是反映农村社会变迁的客观依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空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重构。小农经营、男耕女织的“熟人社会”是传统的乡村景观,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逐渐发生蜕变,农田、村落和阡陌小道被工厂、高楼和宽广的街道取而代之。且传统农业生产已逐渐从乡村退隐,乡村原始面貌开始肢解、分裂、扭曲成人们熟悉又陌生的面貌。这种空间的转换并非单纯的物理变迁,更是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个体的身份在这一动态的空间格局中不断游走。一方面,由于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一块地只需要几代人的繁殖,过剩的农村人口只能溢出在外,涌入城市,寻求新的生计和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置身于高楼林立、喧嚣复杂、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乌托邦”式的欲望、城市生活的焦虑及无力感和挫败感油然而生。人们又去追求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淳朴,是一种美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最后,通过分析乡土文学中空间的转换与身份的游走在影视剧的视觉化表达,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为我们呈现一幅幅生动而震撼的画面。通过镜头的捕捉和叙事的编排,赋予乡土文学丰富的符号意义。

一、空间的转换：社会变迁的镜像

空间并非是简单的容器,它蕴藏着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强调:“空间并非仅仅是冰冷、抽象的容器,而是充满社会、政治和经济内涵的产物”^[2];同样,福柯将空间与权力相联系:“空间是权力和知识运作的场所,不同的空间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3]。因此,空间的转化成为了一面镜子,折射出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起初,由于交通技术的不发达,人们一般都束缚于那个固定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狭窄空间里——故乡。人们的目光所及,只能是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周遭的空间。人们缺乏对其他空间的感知,只能注重时间之变,即季节之变或农作物之变。于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成为庄稼人劳作的自然法则。这个呆板的、固定的空间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场所,更是人们的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通常,人们不会轻易更换和搬离这个空间,不会失去同这个空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赖以生存的空间一旦失去,仿佛丢失了自己的身体。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交通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流动变得愈加频繁。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使得人口的空间转换有了内在要求,直接促成了工业城市的居住空间的发展。原本寂静的农业社会,变得喧嚣不止、躁动不安。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建筑成为标准化的、统一的空间。被规训出来的城市,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位,久而久之形成了空间隔膜。同时,“人变成了一个有固定线路的机器人,在城市中自动地重复着,日复一日,毫无悬念,单调乏味”^[4]。由此可见,在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中,人成为了被动的、麻木的机器。空间已不再是人身体的一部分,不断地被物化。

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高加林生活在陕北的农村,身处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的空间。以种地为生,本应该是符合乡村空间最为基本的运行规则。然而,高加林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对知识的追求让其无法在乡村空间中获得身份认同,无法再去遵守乡村独有的运行规则。当他有机会离开农村,前往城乡交融的县城时,现代空间的场所带来了思想与观念的差异,街道、建筑与现代化的景观演化为内心深

处的憧憬，填补着乡村空间与现代空间的沟壑。最终，高加林因为各种原因又不得不回到农村。此时的农村，熟悉又陌生。他曾经试图逃离这个地方，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但现实却让他重新回到了原点。再如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呈现了农村的广袤土地、破旧窑洞、简陋的学校等场景，构建出一个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空间。随着剧情的发展，城市中的工厂、街道、学校等空间与乡村的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孙少平从农村走向城市挣扎与奋斗的过程，使观众共情的是在不同文化空间的抵抗与嘶吼，而是获得最基本的身份认同的悲鸣。陕北的农村空间和城镇空间交替呈现，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更反映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生存空间的逼迫与挤压。

从拥有固化的、独特运行法则的乡土文化空间到标准的、规划的城市文化空间，空间的转换宛如一面心中的镜子，见证了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重组，勾勒出文化、空间相融时的沟壑，呈现出人精神上的无奈与遐想。当我们看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逐渐与城市的水泥街道相互交织在一起，欲望与反抗交织在一起，怀念与无奈交织在一起，逐渐描绘出人的精神轮廓，记录着社会生活的原貌。

二、身份的游走：人的迷茫与无力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城里人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5]。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城里人”和“乡下人”有着较为明显的界限。这种界限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人由于环境所衍生的某种权利，本质而言就是乡村与城市的区隔。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加剧了当今城乡人口流动的困境。人们不断穿梭在“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双重身份之间寻找着身份的合理性解释。诗人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中描述到“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黄土地的人/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6]。这种身份边界的模糊让他们产生了孤独感和漂泊感，成为了“无根”之人：“他们似乎双脚悬空，城市与乡村都与他们无涉，他们在城市扮演‘城里人’，又在归乡时‘卸妆’”^[7]。一方面，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离开了那个依靠土地，生活节奏缓慢的熟人社会，来到了竞争激烈且效率至上的陌生城市。复杂的人际关系、对技能和知识的高要求让他们无所适从。身份也从“农民”幻化出更多角色、如农民工、工人、城市流民、小区业主、市民等。每一种角色都会带来不同的体验，人们对原有的相对稳定的角色（农民）认知逐渐瓦解，却带来了角色认知与身份认同混乱时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是熟悉土地的农民。他们更像是往返和挣扎在两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候鸟”，两不依靠、无所依托，身处无法安顿的尴尬困境。

贾平凹的作品《高兴》讲述了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和他的伙伴五富在城市中的艰难生活。一方面，初入城市，他努力学习城市人的言行举止，来适应城市的规则和生活方式，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他在城市中被歧视、工作辛苦且不稳定，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可他心有不甘。另一方面，他在农村长大，身上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农村生活的习惯。他对农村的土地、人情有着深深的眷恋，这是他难以割舍的根源。通过描述主人公的艰难处境，反映出刘高兴内心的矛盾与迷茫，他既无法完全摆脱农村身份的束缚，又难以真正获得城市的认同，处于一种尴尬而无奈的境地。再如，路遥的《人生之路》中高加林一次次从农村走向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他的身份游走反映了当时农村知识青年在面对城乡差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的困境和挣扎。这种矛盾的心态和身份的转换，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也最终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这种身份的游走，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心灵的漂泊。在新的环境中，他们需要重新适应

规则、文化和人际关系，旧的认知和经验可能不再适用，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完全建立。人们在不同角色之间频繁、混乱的转换中猝不及防，新旧观念的“困惑感”与“撕裂感”侵袭着人们。于是，迷惘如影随形，无力感油然而生。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交织中徘徊，努力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却常常陷入迷茫与无助的境地。

三、符号的解读：银幕上的再现

文学和电影总是存在着一种若隐若现的内在关系，“实际上它们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8]。乡土文学在影视化改编的浪潮下，更加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首先，改编使得乡土文学跨越时空的限制，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与观众产生连接。通过影视改编的形式，原本只存在于文字间的乡村风貌、人文情怀得以具象化呈现，让观众更易产生共鸣。其次，技术作为乡土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有力支撑，为其发展提供更多新的可能。先进的特效和拍摄手段能够逼真地还原乡土景观，增强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画面张力。同时，导演能够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采用多线并行、时空交错等手法，更深入挖掘乡土文学作品中复杂的人物情感和丰富的主题意蕴。最后，在这个全息时代，拓宽了乡土文学作品及影视化改编作品的传播渠道，打破了地域和时间限制，借助长尾效应，增加其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

视觉符号作为一种强大而直观的表达方式，具有深刻而丰富的表现力。其中人物形象和服饰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符号元素。而服饰则是人物形象的外在延伸与装饰，更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社会的风尚与变迁，是身份的标识，区分个人身份、地位与审美取向。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黄亚萍是城市的代表，身穿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连衣裙、高跟鞋以及精致的配饰，往往展现出更加自信、开放、时尚的气质，谈吐举止间透露出一种文化修养和自信态度。这些特征不仅是外在的装饰，更是城市的象征。反观刘巧珍，多穿中规中矩、颜色单一的上衣和长裤，形象更为朴实、内敛，眼神中更多的是羞涩和纯真。注重衣服的舒适度和耐用性，反映出农村劳动生活的实际需求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形象、直观的视觉符号，反映了城乡之间天壤之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将叙事空间由西北县城农村延伸到了上海，体现出更为广阔的时代景观和人文命运”^[9]。城市的时尚和开放，农村的朴实和内敛在视觉符号中得以清晰地呈现，为读者展现了不同空间别样的美学景观。

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赋予作品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特定地区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在作品中巧妙运用方言，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进而塑造更加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由乡土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中，导演对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尤为频繁，不但可以增加作品的乡土气息，还能深化城乡差异和文化冲突等主题。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主人公高加林的语言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城乡的分野。当他身处乡村时，与父母、乡亲们交流使用的是地道的方言。那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方言，不仅是简单的语言符号，更承载了乡村生活的醇厚情感和独特的文化氛围。然而当高加林有机会进入城市，他的语言逐渐融入了普通话。在城市的工作场所、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他努力用标准的普通话来表达自己的。此时，他的措辞更加规范、严谨，语法也更为准确。这种语言的转变并非仅仅是表面的交流工具的改变，而是反映了他内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融入城市文化的努力。通过高加林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切换，可以深刻感受到城乡之间在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距。电视剧《人生之路》编剧洪靖惠认为：“……高加林对于他所属的时代，是一个开创者，他身上有一种和命运搏击、在时代中激荡的英雄主义……”^[10]。方言代表着乡村的内敛、稳定和传统，而普通话则象征着城市的开放、进步和现代化。这种语言上的差异，生动地

描绘出高加林在城乡之间徘徊挣扎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地反映出城乡社会的不同风貌和文化特质。

城市范围扩大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却时常感到自己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内心深处涌起对家乡故土的怀念之情。首先，空间挤压与生活压力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感与漂泊感。城市范围的扩大导致人口密度增加，土地资源紧张，住房、交通等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在城市中面临着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竞争压力，生活空间被不断挤压，这使得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感到疲惫不堪。其次，社会关系的疏离易于人们滋生孤独之感。城市化过程中，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结构逐渐瓦解，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功利和表面化。相比于乡土社会中紧密的人际关系，城市中的个体更容易感到孤独和无助，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于是，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家乐作为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情感寄托，但仍无法真正替代乡土空间。

这些外在的形式虽能带来一时的新奇，却难以真正触及人们内心深处对乡土的那份深厚情感。那是对根的眷恋，是对故乡山水、人情的深深牵挂，无论城市如何发展，这份乡土情怀都将永远在心中珍藏，成为生命中最柔软的角落。

结语

乡土文学的影视化改编，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将文字符号转化为视听符号，更加直观、形象地感受乡土文学中描绘的美学景观，更能体会到它所承载的丰富情感和文化意蕴。然而，乡土文学影视化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精准把握和传达乡土文化的精髓是重中之重，避免在改编过程中对其进行肤浅的、歪曲的处理。另一方面，在碎片化的时代，短视频充斥着整个市场，如何制作出既能饱含丰富的文化价值，又能吸引观众眼球的高质量作品，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且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影响下，观众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厚的人文价值。但不可否认，影视改编为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乡土世界的变更。相信创作者会以更加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社会责任感，以更加真实细腻和深刻的方式展现乡土世界的美学景观和文化意蕴。同时，观众也要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以更加包容开放、理性的方式去欣赏和感受其中的深刻内涵。未来，乡土文学及改编作品将不断创新，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亢宁梅.《乡愁与现代性的冲突与重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 87 页.
- [2]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 102 页.
- [3]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 193 页.
- [4]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 130 页.
- [5] 费孝通.《乡土中国》.青岛出版社,2019:第 2 页.
- [6] 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大学出版社,1996:第 15 页.
- [7] 韩春燕,顾吾珏.《在城市与乡土之间——“城乡文学”写作的新趋向》.《当代文坛》,2022 年第 5 期.
- [8] 陈铎.《当文学性遭遇电影性——试论台湾新电影对乡土文学的改编》.《南京晓庄学院报》,2023 年第 2 期.
- [9] 吴月玲.《电视剧<人生之路>：接续时代的改编》.《中国艺术报》,2023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 [10] 洪靖惠.《<人生之路>：名著改编接续文脉的探索》.《中国电视》,2024 年第 8 期.